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文学与
市民文化

20 SHJI ZHONGGUO WENXUAN
JIAZHIGUAN YANJIU CONGSHU

田中阳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文学与
市民文化

20 SHIJI ZHONGGUO WENXUAN
JIAZHIGUAN YANJIU CONGSHU

田中阳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文学与市民文化 / 田中阳著.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2

(百年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I. 百... II. 田...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094 号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研究丛书

百年文学与市民文化

田中阳 著

责任编辑: 符本清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韶山北路 643 号)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印张: 13.375 字数: 346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7-5355-3801-0/G·3796

定 价: 23.00 元

本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 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前言

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必然包含着价值判断,文学家的赞赏与贬抑、肯定与否定都或明或隐地体现在作品的各要素中,形成文本的召唤结构,引导读者从审美活动中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20世纪中国文学由于与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价值判断与选择在作品中的体现尤其鲜明重要,因而20世纪中国文学评论相对而言比较重视从人生意义与价值选择的角度来评判作品。不过,由于时代本身的限制,以往的文学批评在价值问题的分析方面有两点局限是明显存在的:一、从严格的学科领域分界来看,价值观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同一般性的人生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以前的文学批评习惯于将二者混同起来有时甚至将价值学说完全依附于政治意识形态,从而遮蔽了价值观念作为伦理学说的特殊性;二、在文明社会中,价值观呈多元形态,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有阶级意识形态的,也有以共同人性为基础的。以前的文学批评对价值观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政治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方面,而对其他一些类型的价值体系则有所忽略。

最近,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几位教授承担

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的课题,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就是通过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各种价值观念的爬梳整理与分析剖解,突出价值观念与文学创作之间的独特性关系,显示出各种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所具有的独特影响。一方面,为文学与价值观的密切关系确立一个历史性的依据,让人们从理论与历史中认识到,在文学中价值可以被重估、被解构,但是不可以也不可能被驱逐;另一方面,这一课题的研究也说明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主导性的价值体系,这种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同其他各种价值体系之间既有区别,也有相通之处。这种主导性的价值体系如何包容并且充分利用各种价值体系来促进社会文明的多元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问题。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无疑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正是出于对 20 世纪中国文学价值观问题之关注,当课题组成员前来联系这套丛书出版事宜时,我们欣然答应下来,并初步拟定人文主义、传统文化、宗教伦理、市民文化、后现代主义等价值体系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体现,作为这套丛书的主要内容。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来告诉人们,如果文学的领地只允许一种价值体系的存在,文学就无可置疑地会变得单调、枯燥与板滞,同样,在多元格局的价值形态中,文学家如果不能明确自己应该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文学也就难以完成它的人类文明建设的责任担承。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套丛书,我们对这一课题研究的结果在编辑体例上作出了统一的要求,但在学术观点与写作风格上,我们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给作者一个自由与充分发挥学术个性的空间。我们希望这一套丛书能够较好地实现我们的出版构想与目的,并热切期盼着读者们的批评指正。

2002 年 10 月

自序

读大学的时候，“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就深深地种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脑子中了。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郑重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深深地影响着其后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学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善教化，移风俗”，等等。那时做的就是能以文学尽“匹夫之责”的人生之梦，故同学韩少功就成了我们的楷模和骄傲。

那个时代是不承认消闲、娱乐的文学存在的价值的，既然鸳鸯派成了五四先驱们声讨的对象，那不是垃圾又是什么呢？文学能够“游戏”的吗？能够“消遣”的吗？

说实话，那时也读不到多少鸳鸯派的作品，似乎也不情愿花时间去读这种没有“价值”的作品，张恨水，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情天恨海”的意思。一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至

今也没有他的一席之地。

当我们在大学这块“净土”里默默地如此“耕耘”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却被商潮搅得天翻地覆了。金钱，成为社会最具力度的杠杆，成为最基本的价值尺度，成为不竭的动力源。商品化迅速漫染社会全境，文学艺术也风过草偃，不能幸免。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的数年里，就在文学艺术迅速商品化的时候，我每天在中小学放学的时节，就得骑着单车到学校附近近百家电游室寻找我的儿子，我甚至利用在媒体工作的学生的关系，动员记者和工商管理局的人员联合去捣毁隐藏在孩子读书的校园里的电游室。鲁迅小时候“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把衣服和首饰当了，然后到药店去为久病的父亲买药，这成为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社会情景；而我，在不惑之年里，几乎是每天，出入于电游室，去寻找我的惟一的儿子，这也成为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充满苦涩的一种典型的情境。电游室衰微了，网吧又兴起了。我又到网吧去寻找我的儿子。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文化场却变成了毒害青少年的工具，成为“精神鸦片”。偶然的会，我也去过夜总会，当演出结束时，一个个袒胸露怀的小姐，在《国际歌》的演奏中谢幕，使人感觉世界已面目全非；而侏儒与靓女同台演出，胖得一身肉颤的主持人痞话连篇，更成为高额票价的卖点。大陆市民通俗文艺高潮迭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上发生的，它和前面那些现象如血肉连成一体，它们都殊胎暗结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的市场经济这个机体上。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市民通俗文艺就不断地占领所谓“纯文学”的地盘，各种“纯文学”的期刊纷纷倒闭或

易帜，市民通俗文艺相当霸气地闯入文学的殿堂，毫不客气地把“纯文学”挤到边缘地带。先是港台通俗文艺漫卷大陆，琼瑶、金庸、三毛，红遍大江南北，港台通俗歌曲，低水平的言情片、武侠片也飞布社会的每个角落。继之，大陆自产自销的产品也纷纷投入市场，王朔、何顿，《废都》、《骚土》，新写实、新市民，“美女作家”、“70年代人”，等等，色彩斑斓，各有卖点。鸳蝴派死灰复燃，火势比前更猛，言情、武侠征服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并没有过去。

面对这种局面，每一个不是起哄的而是富有责任感的文学研究工作者都会问一个“为什么”。绝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切归罪于“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更发达得多得多的欧美社会，高雅的文学艺术照常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也不能把这种现象说得一无是处，无以匹比的受众优势说明了这种通俗文艺一定有它存在的合理性。这就把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市民文学、尤其是市民通俗文学的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

当我面对繁盛的市民文学发问“为什么”的时候，一种因果链就在不断深入的思考中产生了。市民通俗文学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魅力呢？它到底在哪些方面获得市民的青睐呢？而它的创作主体、表现主体和接受主体又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质地呢？他们所依凭而行的历史河床及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背景和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一种学术灵感就这样从我的思维深处迸发出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研究20世纪市民文学将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课题。它绝不仅仅是研究那种通俗的不值得去作条分缕析深入剖解的非经典性文本，它是研究一种十分复杂而有意义的文化现

象，一种十分复杂而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它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研究点。随着阅读和思考的深入，我明白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乃至一个世纪以来，市民文学发展的如此情状，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的历史现象，是中国式的市民文学。我掂到了这个课题的分量，我明白它的研究价值正在这里。

这些思考就构成了我写作本书的思维平台，也构成了贯穿本书的一种研究视角，一种研究立场，一条思想线索。这种思考在写作中的体现就构成了本书的基本价值。总论部分，就是集中破解一些基本问题的，诸如对“市民”、“市民文化”、“市民文学”等基本概念的辨析，对中国市民文化和市民文学历史嬗变的描述，对中国市民文化与市民文学的区域性比较，对中国市民文化和市民文学内在的处于不断蜕变中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重构的考察分析，等等。后面铺展开的五章则是选择最典型的市民文化价值观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影响作局部的分析，而这些局部分析又钩连成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学术整体。所有这一切的研究，都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这种背景上发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嬗变中，去破解中国市民文化和市民文学的生存密码。

我深知我的努力是很有限的，由于时间的逼仄，许多细部来不及精雕细琢，这将给本书留下许多遗憾。而从市民文化视角去研究20世纪中国市民文学也绝非从我开始，之前已有许多优秀的或杰出的学者做过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以范伯群先生为代表的江苏学者对鸳蝴派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吴福辉先生对海派的研究，都堪称学术研究的典范。正由于有了他们的成果，我才有可能去对20世纪这一百年的中国市民文学作一种整合性的文化思考。这也许构成了对他们研究

的某些超越，而这种超越正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在新世纪灿烂的晨曦里，我们看到，一座座现代的城市正映现出它们美丽而雄伟的身影，古老的中国正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越来越多的“老中国的儿女”正在蜕去他们旧的衣裳，洗涤心灵深处的旧的积垢，成为新世纪的主人。中国市民文化和市民文学经过一个世纪的“蜕变的尴尬”，在新的世纪获得新生不应是太遥远的事。我写的这本小书既是对过去中国百年市民文化和市民文学的回眸，更是对新世纪中国市民文化和市民文学新生的殷切期望！



作者简介

田中阳，湖南湘乡人，1954年4月生。1966年小学毕业即失学，推板车两年后随父“上山下乡”，直至1977年考入湖南师大中文系，历时9年。1981年12月大学毕业后，除在湖南省教育厅工作一年多外，都在高校任教，1997年评为教授。现任湖南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1985年开始发表文学研究论文。主要著作有《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文艺湘军百家文库·田中阳卷》、《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其著作两次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两次获湖南图书奖二等奖。

目 录

出版前言	(1)
自 序	(1)
第一章 总 论	(1)
一 几个基本概念的辨识	(1)
二 中国市民文化与市民文学的历史嬗变	(17)
三 中国市民文化与市民文学的区域性比较	(63)
四 蜕变的尴尬	(105)
第二章 尚金：无情最是黄金物	(135)
一 尚金：市民文化价值观的主脑	(135)
二 “我把作品当作商品”	(143)
三 无情最是黄金物	(159)
第三章 尚俗：平平常常即是福	(188)
一 消解崇高，以俗为本	(188)
二 生存为上，活着就好	(212)
三 市井人生，闾巷风俗	(235)
第四章 尚情：梦的抚慰与欲的宣泄	(259)

14075/23

一	俗人生的抚慰之梦·····	(259)
二	欲的伸张与宣泄·····	(284)
三	煽情的艺术运作·····	(320)
第五章	自主：上帝就是自己·····	(331)
一	依附——自主：人格的艰难涅槃·····	(331)
二	女人当自立·····	(355)
第六章	消闲：审美的价值取向·····	(380)
一	“玩文学”之“玩”·····	(380)
二	“快餐型”的生存样式·····	(393)
参考书目	·····	(408)
后 记	·····	(411)

第一章

总 论

一 几个基本概念的辨识

当我开始审视“20 世纪中国文学市民文化价值观研究”这一课题时，我深知它的研究的艰难性。在我的脑际中，各种悖论和错综复杂的现象纷至沓来，我感到难以言说清楚。在一个以农为本、重农轻商、宗法文化绵延数千年的国度和自 1840 年鸦片战争沉重起步至今的 160 年的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探讨 20 世纪

中国文学与市民文化价值观的关系，是一件何其复杂的工作！你如何剥离？你如何剔除？你如何理清？你如何自圆其说？倘若不把这一课题和这个大背景交融一体进行研究，那会有多大价值？当我的思维大方向在思考中逐渐定位的时候，许许多多的概念、观念就一拨接一拨地涌来了，诸如宗法文化、农本社会、重本抑末、儒道释、义与利、城市、乡村、传统城市、现代城市、市井、都市、农民、市民、传统市民、现代市民、大市民、小市民、中西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殖民文化、外来影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农民意识、市民意识、小市民意识、海派、京派、汉味、上海、北京、武汉、广州、台港、特区、鸳蝴、言情、武侠、新写实、新历史、新市民、新状态，“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时间就是金钱”、“我是流氓我怕谁”、“上海宝贝”等等，等等。不把这些概念、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清楚，我想，“市民文化价值观”是难以抽绎出来的，定不好位的。因此，特设“总论”一章，来廓清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理清一些基本线索。在“总论”的第一节，通过辨析几个最基本的概念，作为本课题研究的逻辑起点。

首先辨析的是“市民”这个概念。“农民”这个概念似容易界定，但“市民”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易界定辨析的概念。何谓市民？《新华词典》释为：“1. 城市居民。2. 指封建社会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等。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市民逐渐分化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贫民。”《辞海》则释为：“1. 在古罗马，指享有公民权的罗马人，以别于没有公民权的外来移民。2. 指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居民。因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反对封建领主，要求改革社会经济制度。

17、18 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市民逐步分化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3. 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辞源》则仅释为“城市居民”,并以汉荀悦《申鉴·时事》“山民朴,市民玩,处也”和《宋诗钞》汪元量《水云诗钞·醉歌》“北师要讨撒花银,官府行移逼市民”等诗文为佐证。这些辞书对“市民”一词的界定在一般意义上的解释都是一致的,即指“城市居民”,而《新华词典》和《辞海》亦强调“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及“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这些对近现代意义上“市民”特征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强调近现代市民的阶级差异。

然而我们在文化和文学范畴运用“市民”这个概念的时候,更多的场合是指一种生存状态,一种文化形态。尤其是“小市民”这样的界限不清晰的概念的频频使用,增加了“市民”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在辨析“市民”这个概念时,首先我们要和“农民”区别开来。中国的农民和发达国家的农民是有着不同的内涵的。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人口城市化的进程,城乡差别已经很小,“农民只是市民范畴内从事农业工作的群体而已”^①。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城乡差别仍很巨大,因此,农民不属市民范畴”,“中国的农民概念,不仅专指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还包括那些已经从事非农业生产而尚未改变农民身份的人。所以中国农民是指所有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具有农民身份的人”。而“市民专指住在城市的、具有‘城市户口’的公民^②。”随着时代的发展,这样的界定捉襟见肘已显而易见。因为中国的城

①② 胡玉海:《市民意识与农民意识》,《辽宁大学学报》1998 年 6 期。

市在飞速发展，“户口”观念也在淡化，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比差也在大大减少，出现了许多城乡之间的边缘性人群。从“户口”的角度看，他们也许还是农民的身份，但从他们的职业涵义及文化价值观来看，他们已经属于“市民”的行列。因而从我所研究的这个课题出发，我更多地是从文化价值观去圈定我所研究的“市民”范畴。

研究“市民”，尤其是中国“市民”，更应该从历史的演变去做一种动态的辨析。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城市文明是在不断进化着的，有学者认为，人类文明史可说是一部城市化运动和非城市化运动的对抗史。那么，市民是城市的主人，是城市文化的主要载体，没有城市就无所谓市民，没有市民就无所谓城市，城市的历史性演进和市民的进化是同步的。古代的城市是封建政治、文化统治的中心，如我国的西安、北京、南京等城市，成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荣的名城。但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不是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城市中落后的手工业生产远远不能够满足城市自身消费的需要，因而统治者的财富来源主要是农村，农业生产成为了城市繁荣发展的主要经济支柱。与古代城市文明这种形态和性质相对应的古代市民主要是帝王将相、贵族阶层、商人、文化人、手工业者、奴仆等。而中国的近代市民则是与中国的近代城市相伴而生的。中国近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世界近代化潮流推动的产物。近代文化本质上是工业文化、大机器文化，毫无疑问，近代市民也是工业文化的产物，工业文化的载体。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摆脱封建的羁绊走向民主和科学的过程，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质量不断提高，以至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已涌现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